

《西铭》与理学“仁孝一本”论^{*}

——兼与当代三种仁孝论商榷

宫志翀

摘 要:仁与孝构成了儒家伦理的主干,仁孝关系是儒家伦理学的重要命题。作为儒学史的又一高峰阶段,理学的贡献之一是显豁仁体,理学的仁孝关系因而有一崭新形态,这集中体现在《西铭》的阐释与争论中。在形而上层面,《西铭》复现了战国两汉时期“父母生”与“天生”的存在论类比。在修养工夫层面,《西铭》引导人由“事亲之孝”体贴“事天之仁”,遥承战国两汉礼学的“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和“报本反始”精神。《西铭》诠释中常关联的孟子“一本”“二本”论,亦有礼学“报本”的渊源。“一本”的原义是“专注于自身所从来”,由此洽接《西铭》的宗旨,可谓由“一本”融贯仁孝,是理学的“仁孝一本”论。以此与当代三种代表性的仁孝论比较,可见“仁孝一本”的优长与当代困境。只有直面形而上学、道德的认识论与心理学等层面的古今之变,作出新的论证,才能使儒家的仁孝论在当代更有说服力。

关键词:仁孝;父母生;天生;一本

DOI: 10. 11714/jssu. sse. 202604010

仁与孝都是儒家珍视的德性。自古至今,儒家在区别自身与其他思想流派时,有时标举出仁,有时标举出孝,罕再举出其他德性。这很能说明,仁与孝二者组成了儒家伦理的主干。仁是人与他者、与社会乃至与上天关系的德性;孝是人与父母、祖宗关系,即家族内部的德性。二者都具有人性基础,都具有普遍性,但它们的人性基础、普遍性覆盖的范围明显不同。由此,仁与孝的关系便成为儒家伦理学的一大命题。

理学是儒学史的又一高峰阶段。在体系性上,理学将儒学推上了新的理论高度;在立论宗旨上,理学以天理—性理为枢纽,贯通天人,拓开了儒学的新体系。近来,陈来对理学提出了一种新刻画。他指出,儒学史上有一个“仁”上升为“仁体”的理论线索,其始自战国两汉,于理学处仁体得以充分显豁^①。由此可说,理学的任务是以新的体系表彰儒家“仁”的精神,理学推进了仁学。那么,孝在理学中又处于何等地位,理学的仁孝关系如何,是有待进一步深化的问题。对此,“仁体孝用”论是常见的回答。但它在理学之后以至于今受到很多批评^②。各种批评的关切可归结为两类:第一,将“孝”作为次一级的德性,

^{*} 收稿日期:2025—08—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大同书》校订、疏证与思想研究”(22CZX033);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仁孝关系研究”(26XNSJ46)

作者简介:宫志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

① 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75、130、200页。

② 参见唐文明:《仁感与孝应》,《哲学动态》2020年第3期;蔡杰:《程朱理学“仁体孝用论”的批评与重构》,《中州学刊》2020年第12期。

“孝”作为“仁”的一种表现,“孝”附属于“仁”,与儒家推崇“孝”的态度不符;第二,“仁体孝用”论,行孝是为了行仁,行孝是行仁的开端,这不符合道德行为的直觉感受。孝顺父母本身就是充足的道德义务,何以还为了更高的道德目标?这两类批评针对教条化的“仁体孝用”论有效。本文则主张,理学的仁孝关系还有更丰富的内涵、更深邃的思想背景。“仁体孝用”论只是从中得出的结论之一。只有还原理学仁孝关系的内涵与背景,才能如实理解“仁体孝用”论。

无疑,理学不会忽视孝。一则,《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诸经典,当中有大量论“孝”的条目,理学家必须郑重地阐释之。二则,理学家在注释经典之外,还有自抒胸臆,阐发思想宗旨之时,尤其拓开仁体的各层面时,就会触及仁与其他德目的关系,仁孝关系自是其中之一。故而,理学会立足于仁体论来理解仁孝关系。张载的《西铭》便是理学讨论仁孝关系的中心文本。我们先扼要复述这段思想的历史。

对于《西铭》,张载并未明言其全篇宗旨。从二程开始就明确《西铭》的意义之一是恰切刻画了仁孝关系^①,为后世定准了该篇的思想方向。随后,杨时的质疑从反面提示着,《西铭》内在的紧张就在于仁与孝的关系。杨时怀疑《西铭》有流于兼爱的可能,二程则在回答杨时疑虑时,创造了理学核心概念——理一分殊。这一最初用以刻画仁孝关系的概念,后来成为理学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这也提示我们,仁孝关系不止在道德经验的层面处理,还必须探究其形而上基础。此后《西铭》的阐释仍在继续,吕祖谦、张栻、朱子皆有注,特别是朱子《西铭解》斟酌十六年才定稿。同时争论也在继续,最应注意的是朱子应答汪应辰、陆九韶、林栗、郭雍等人的质疑。那场论争中,仁孝关系始终是焦点,“理一分殊”始终是朱子立论的基础。可以说,以朱子《西铭解》为中心,配合相关语类和辩难,奠定了《西铭》在理学传统中的地位,也奠定了理学仁孝关系的规模。此后,理学传统基本在朱子规模下申发。直到王夫之才在佛教的刺激下,重新讨论了《西铭》与仁孝关系问题。总之,论理学的仁孝关系,固需囊括各处经典文本的注释和学者的往复讨论,但诸种讨论若需一理论的总领,则非《西铭》莫属。

那么,理学何以在《西铭》中遭遇仁孝关系?质言之,仁孝关系的基本分界在于:孝是家内的美德,它本乎对父母生育之恩的回馈;仁既是面向他人的普遍美德,也是人的德性的完满,儒家往往将其归诸“天”的感召。是故,理解仁与孝的关系,在分析道德情感、行为、效果、空间诸现象外,其最终的衡平,务必于两种道德的存在论基础上分疏,即孝本于父母,仁本于天。张载的《西铭》恰在气化论当中,刻画了天地与父母的关系,从而拓开了讨论仁孝关系的新空间。

开篇已述,理学的突出贡献是确立了仁的本体地位。这一本体地位的内涵可概括为:仁体本乎天,仁体发见于天地之生生流行。张载正是理学探索仁体的开端人物,他正是于《西铭》中以气化论表明仁之体本于天,并对照地指出孝之体本于父母,进而带出了天与父母、仁与孝的关系问题。从二程到朱子再到王夫之,理学的仁孝论之所以都在《西铭》中进行,恰因重视其存在论背景。当代《西铭》研究偏重气论、仁论,于理学家曾经着意的仁孝关系、理一分殊、一本二本诸问题论及不多。十余年来,仁孝关系问题再受瞩目,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继续深入的重要议题^②。本文认为,重回理学仁孝关系论的思想现场,重新立足于《西铭》阐释与争论的空间,能有效发掘传统思想资源,为当代探讨提供镜鉴。

① “仁孝之理备于此,须臾而不于此,则便不仁不孝也。”“仁孝之理,备于《西铭》之言。学者斯须不在,是即与仁孝远矣。”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9、1179页。

② 这很大程度受21世纪以来“亲亲相隐”论争的刺激。此外,张祥龙长期以现象学探讨“孝”与“仁”的存在论意义也影响深远。近年围绕仁孝关系的代表性研究有刘梁剑:《天亲合一与身体的成长——船山〈西铭〉题解孝道思想引义》,《船山学刊》2020年第2期;唐文明:《仁感与孝应》,《哲学动态》2020年第3期;田丰:《论仁孝二本》,《哲学研究》2020年第11期;宫志翀:《“人为天生”视野下的仁与孝、公与私》,《道德与文明》2022年第4期;吴飞:《仁之实与仁之端——〈孟子〉仁说发微》,《道德与文明》2023年第4期;赵金刚:《恻隐与亲亲——仁孝何以一本》,《中山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

一、复现“父母生”与“天生”类比

程朱都称赞《西铭》“体用”兼具^①。所谓“体”指“仁之体”，即仁的形而上实存；所谓“用”指“仁之用”，或谓“求仁之方”^②，即仁的具体实践。本文也分别从这两个层次展开。

《西铭》如何展现“仁体”？它使用了一种存在论的类比。其以“乾称父，坤称母”发端，延伸出“民胞物与”“大君者，吾父母宗子”等观念。这是以家庭中的伦理关系，类比人与天地、与他人万物、与君主等的关系，以揭示人在天地之中的存在论位置。这一方式在当时就多受质疑，于现代研究则概以修辞手法视之，不深探其意。殊不知，《西铭》此番论述继承了儒家存在论的深远传统，程朱也是在此传统中阐释《西铭》。

为何言“乾称父，坤称母”，将天地类比为父母？这其实是儒家反思人何以为人、人的存在本源的一个传统。当人开始思考自身所从来，直接的源头是父母。儒家正因为重视父母生子的存在论意义，才凸显“孝”的必须。然而，父母也是祖、曾、高所生，沿着亲缘链条上溯，势必追寻到超验的存在本源为止，那就是天地。这样看来，人的存在是一个深远的链条，最切近处是父母，最根本处是天地，中间则是二者的延伸及结合。不过，人本于父母是切近的经验，而天地使人成其为人，则需要更深的存在论反思来获得。是故，为形象地把握人的“天生”身份，战国两汉儒学就以“父母生”类比指示“天生”。最具代表性的表达有董仲舒“父者，子之天；天者，父之天”“天亦人之曾祖父”“天者，万物之祖”等说法，以及《春秋》今文学传统影响下人皆是“天之子”，“天子”是“天之元子”的说法^③。至于以父祖类比“天地”的目的，则是赋予人以“天生”的使命——“仁”。如董仲舒谓“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④。总之，战国两汉儒学为揭示人与天地、与仁体的联系，以“父母生”类比“天生”的说理方式，构成了仁学的一条存在论传统。

回到《西铭》，“乾称父坤称母”二句，朱子就把握住这种类比关系。他指出，人为“父母生”外，还有更高的“天生”本源，并且可从“父母生”类比地理解“天生”的真实。他说：“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则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则万物同一父母矣。”^⑤只是朱子当时以“譬喻”言之^⑥，而如今视譬喻为修辞方法，忽视其说理的意义。故我们转用“类比”表达之。哲学的说理方式不止有概念的辨析与推理，类比作为哲学的另一种说理手段，伴随着各大哲学传统始终，在形而上学、神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等领域广泛适用。中国哲学传统的同样兼具概念和类比等多种说理方式^⑦。

① “《订顽》言纯而意备，仁之体也。”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203页。“横渠这般说话，体用兼备。”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370—2371页，另参第2519页。

② 杨时：《杨时集》，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450页。

③ 参见宫志翀：《战国两汉“人为天生”学说的政治哲学意蕴》，《哲学研究》2021年第1期；常达：《“天之元子”与“民之父母”：传统中国“家国一体”的伦理基础》，《道德与文明》2025年第2期。

④ 董仲舒著，苏舆义证：《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18、329页。

⑤ 朱熹：《答陆子美》，顾宏义：《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814页。真德秀发挥此旨曰：“《西铭》推事亲之心以事天，盖父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天赋以气，地赋以形，父母固我之父母也，天地亦我之父母也。朱文公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与物、己与人皆共以为父母也。’父母之生我也，四肢百骸无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后为不忝于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无一不备，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后为不负于天地。故仁人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此又《西铭》之妙指，不可以不知也。”真德秀：《问答一·问父母惟疾之忧》，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13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58页。

⑥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2521页。

⑦ 近来关注类比说理的研究有龚隽：《从“能近取譬”到“指事问义”：中国哲学的一种说理方式》，《人文杂志》2022年第2期；李友广、李宗敏：《先秦儒道政治理论中的类比思维及说理方式》，《逻辑学研究》2025年第1期。

当然,类比也必须规定其限度,当时有不少质疑由此而发。朱子特意就《西铭》“不曰‘天地’而曰‘乾坤’”的巧妙分寸,展开解释称:“天地其形体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无息之谓,万物之所资以始者也;坤者,顺而有常之谓,万物之所资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为天地,而父母乎万物者,故指而言之。”^①这表明,不能将“天地”为“父母”的类比,教条地理解为形象的事实。应当说,此所谓“天地”也不是天地的可见形气,而是超验的“天地之道”;同样“乾坤”也不是可实指对象,而是天地之道的两种属性。

那么,类比指示天地生人的存在本源有何意义?朱子认为,这能更好地揭示“仁体”真实不虚:

古之君子惟其见得道理真实如此,所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推其所为,以至于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谓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与乾坤都无干涉,其所以有取于《西铭》者,但取其姑为宏阔广大之言,以形容仁体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则是所谓仁体者全是虚名,初无实体,而小己之私却是实理。^②

朱子指出,儒家宏阔的文明理想,如“仁民爱物”“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之类,不能视作理论体系演绎出的想象图景,也不能视作虚设的修辞,所谓“非亿之也”。它必然建基于“道理真实”的形而上基础,这要求揭示“仁体”的真实存在。然而,当时批评《西铭》的一种意见便是“人物只是父母所生”,这才是亲切可见的。这是仅从“父母生”的角度理解人的存在,认为天地乾坤之道无与于人物之生。可推想其伦理主张便是人人只顾其家,人人只有孝的义务。即使这种主张能善意接受《西铭》的“宏开广大之言”,也只是视作为超越一己之私而姑设虚辞。对这种主张而言,“仁体”只是理论假设,并不实存。

朱子指出,只认得“父母生”为真实的存在本源,是只见分殊,不见理一。他说:“其大小之分,亲疏之等,至于十百千万而不能齐也。不有圣贤者出,孰能合其异而会其同哉?《西铭》之作,意盖如此。程子以为明理一而分殊,可谓一言以蔽之矣。盖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③朱子也意识到,不是人人都能认识到理一的“天生”之本,这需要更深入的存在论的反思溯源。圣贤认识到“人”与“仁”本于天,是超越经验的存在论真实。惟有经圣贤的揭示,人类存在论的结构、道德伦理的体系才完整且真实。张载和《西铭》的贡献显然在此。

所以,《西铭》在类比基础上顺理成章地得出“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是极为关键的一句^④。它承接了儒家仁学的一贯信念:人正因承受了天地的馈赠,才有高贵、自立的形体与性情。这种信念不只为了解释仁内在于人本身,鼓舞人的道德自觉,同时也是提出成仁以回应天命的一种要求。因为在天的注视下,仁德的性质是庄重与宏大的。天的绝对超越使仁具有整全性,是最高的德性,没有其他德性堪为其匹,故理学主张仁为全德。同时,天的广覆无外,使仁具有普遍性,故理学主张“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立足于人为“天生”的本真性,《西铭》拓开了下文“民胞物与”一段^⑤。朱子注“民吾同胞”谓:“惟人也,得其形气之正,是以其心最灵,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体,于并生之中又为同类而最贵焉。故曰‘同胞’。则其视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如下文所云。”注“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与“凡天下疲癃残疾惻独鰥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谓:“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则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则凡天下之疲癃残疾惻独鰥寡,非吾兄弟无告者而何哉?”^⑥

这两处注释里,朱子复现了战国两汉时期“人为天生”思想中的两个观念:“天地之性人为贵”与“人皆天之子”。它们既指向一种基于人类尊严的普遍道德,包括关爱、尊重、团结、不伤害等基本要求;也通

①③⑥ 朱熹:《西铭解》,朱杰人等主编:《新订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141,145,142页。标点有调整。

② 朱熹:《答陆子美》,顾宏义:《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第1814页。

④⑤ 参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2519、2523、2523页。

向基于人类尊严平等之上的德位合一、希圣希贤的原则,“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圣其合德,贤其秀也”是其表现。特别是张载以“宗子”类比“大君”,也复现了两汉时期以“天子”为“天之元子”的信念。朱子答林栗的相关质疑,恰切把握了《西铭》这一类比的旨意^①。

总之,儒家存在论与伦理学的反思,不止立足于切近的经验事实,更追索至超验的本源。以“父母生”为透镜,类比地描述人与天地的关系,在古代思想世界中是一种形象有力的说理方式。毕竟,高渺的“天生”之义难以直白地言说之,类比提供理解的阶梯。并且,这一类比可依据古典的气化宇宙论过程而成立。因为,人由父母所生是气化过程的末段,沿着气化形成的“存在之链”上溯,类比地体会“天生”之义是可能的^②。相应地,“天生”与“父母生”的划分,在个人身上就反映为仁与孝的区别。这能使人反思地理解仁与孝的来源,仁与孝在人身上表现的特质等。是故,存在论的类比其实先起到了划分的作用。依此,我们可将“仁”重新定义为“事天”之德,正如“孝”往往被定义为“事亲”之德。

二、“事亲之孝”与“事天之仁”的贯通

进而,类比也旨在贯通“父母生”与“天生”、仁与孝二者,这是《西铭》理学阐释中更受重视的一面。上节讨论已表明,类比不是概念的兑换,批评它将“天地等同于父母”者,错会了当中的含义。类比是一种引导反思的方法^③,它就着切近的“父母生”之本,以观察和体认“天生”之本。上节“事亲之孝”与“事天之仁”的划分,我们对准了体认的焦点,接下来便是就着“事亲之孝”中的诸情感与方式,体认“事天之仁”的情感与方式。

其实,战国两汉儒家有过多种先行探索,我们仅举一例,因其特别地为理学所吸收。《礼记·哀公问》“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郑玄注:“事亲、事天,孝敬同也。”^④《孝经·感应章》“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郑玄注:“尽孝于父者,故事天明。”^⑤这两处都致力于将“事亲”与“事天”贯通起来。再强调一次,不是作概念而等同起来。其意思是,于事亲中呈现的爱慕、敬重、恭顺诸情感,与效法父祖所为等行为,可类比地理解“事天”的态度与方式。类比之所以是可行的,因为事亲之孝是一种“报本”的德性,而事天是在更深远的意义上“报本”。我们的证据是,经典世界中的祭礼体系,无论宗庙之祭祖宗,还是郊祀之祭天地,均以“报本”一义贯之^⑥。

① 朱熹:《记林黄中辨易西铭》,朱杰人等主编:《新订朱子全书》第15册,第3408—3409页。

② 王夫之指出,《太极图说》是《西铭》的形而上学基础。朱子也正是将《太极图说解》《西铭解》一并斟酌多年才写定。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13页。

③ 类比的认知引导意义,参见[美]侯世达、[法]桑德尔著,刘健等译:《表象与本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Paul Bartha, *By Parallel Reason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of Analogical Argument*,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④ 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23页。胡煦、江永均指出此句是《西铭》的先导。胡煦:《周易函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53页;江永:《西铭论》,《善余堂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3年,第4页。

⑤ 郑玄注,陈壁生疏:《孝经正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16页。吕妙芬搜集到一系列明清时期关联《西铭》与《孝经》此句的解释。参见吕妙芬:《多元视域中的明清理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23—431页。

⑥ 参见林素英:《古代生命礼仪中的生死观:以〈礼记〉为主的现代诠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第203—210页;李晓帆:《继孝与报功:〈礼记〉祭礼的人文建构》,《国学学刊》2026年第1期。

回到《西铭》,朱子指出“于时保之”以下进入“用”的层面,是“极亲切”的“做工夫处”^①。此工夫之亲切,恰因《西铭》以经典中本是论“孝”的诸典故或观念,类比地展示人的“事天功夫”^②:

《西铭》: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

朱注:畏天以自保者,犹其敬亲之至也;乐天而不忧者,犹其爱亲之纯也。

《西铭》: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

朱注: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也,故谓之悖德;戕灭天理、自绝本根者,贼杀其亲,大逆无道也,故谓之贼;长恶不悛、不可教训者,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也,故谓之不才。若夫尽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则与天地相似而不违矣,故谓之肖。

《西铭》: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

朱注:孝子,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圣人知变化之道,则所行者无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则所存者无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乐天践形之事也。^③

朱子注也明确地保持这种类比的结构。人只有反思到自身非父母所生育保养则无从得立,只有反思自身的成长过程充斥着对父母的爱慕、敬畏、效仿、继承等,才会有“报本”的孝行。可见,孝也是经过存在论反思的德性^④。《西铭》则引导人再进一步,准照着“事亲之孝”进入更深的存在论反思,类比地认识到:人作为天地之子,秉受了天地馈赠的形体、性情,非此不足以“贵于万物”;认识到人的德性也要在对天地的爱慕、敬畏、效仿、继承等事上成就,才能生出报天地之本的仁。由此,孝与仁构成了“推人以知天,即近以明远”的类比关系^⑤。朱子在答弟子问时,多次强调:“是将孝来形容这仁。事亲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样子。”“因事亲之诚,以明事天之道,只是譬喻出来。”“圣人之于天地,如孝子之于父母。”^⑥后来明清时期的《西铭》解释,便着意抉出《西铭》与前述《哀公问》《孝经》思想传统的呼应关系^⑦,乃至晚清礼学家曹元弼也称许,《礼》与《孝经》之旨“《西铭》最得其意”^⑧。

截至此处,我们沿着《西铭》的脉络,理解了其遥承战国两汉以来的存在论类比思路。这一由孝识仁的思路初衷是“以止私胜之流”^⑨,是故先须奠定仁体,拓开仁道,进而“推亲亲之厚,以大无我之公,因事亲之诚,以明事天之道”^⑩,才能于存在论与伦理学上使仁孝关系“彻上彻下,一以贯之”^⑪。然而,《西铭》言赅而旨远,其类比的说理是反思指引的方法,不是概念的明确界定,不免引人疑虑。其中最突出的,也是《西铭》阐释史上持久讨论的议题,便是《西铭》会否流于墨家的兼爱。这最初由杨时提出,二程以“理一分殊”答之,朱子则在《西铭》解释中全面、深入地运用此说。不过应注意到,朱子注释《西铭》正文时并未引入“理一分殊”。因为如前述分析所示,他如实地沿着《西铭》的类比之路展开。惟有篇末总注时,朱子才揭示出“理一分殊”结构。因为从理论的发展而言,“兼爱”质疑推动了理学仁孝关系另一方面的刻画。如果说类比论是以孝观仁,“兼爱”质疑则迫使理学家以仁观孝,再度划分仁与孝的边界。所以,朱熹在总注中揭示的“理一分殊”,是一个完整的理论结构。类比论是由“分立而推理一”,区别于兼爱,则

①⑥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2521、2526、2521、2526页。

② 朱熹:《答廖季硕》,顾宏义:《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第1449页。

③⑩ 朱熹:《西铭解》,朱杰人等主编:《新订朱子全书》第14册,第143、145页。

④ 吴飞指出,亲亲与孝敬是理性反思的结果。吴飞:《仁之实与仁之端——〈孟子〉仁说发微》,《道德与文明》2023年第4期。

⑤ 朱熹:《答张敬夫》,顾宏义:《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第3288页。

⑦ 吕妙芬:《多元视域中的明清理学》,第423—431、459—461页。

⑧ 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91页。

⑨ 张栻:《答朱元晦》,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55册,第93页。

⑪ 朱熹:《答汪尚书》,顾宏义:《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第2615页。

要“明理一而分殊”^①。

仁与孝构成“理一”与“分殊”的关系,必须依据理学对“仁为全德”的定义。近年,立足于朱子《仁说》、“仁包四德”的研究,已充分展示“仁为全德”的内涵^②。理学的这一定义盖出自两重因素的考虑:第一,周延地解释经典中各处“仁”的观念和语境,特别是孔子不轻许人以“仁”;第二便是理学的仁体论,其极大地显明了仁与天的关系。故仁是事天之德,或谓“仁是天德之全”。天的超越性与无限性分有至“仁”上,使仁具备了超越诸德性之上的至高地位。在气化宇宙论的图景中,各种德性都可取象于天地间气化、形化的某些特征,惟有仁德代表并呼应着天地生生之本体,故其余义、礼、智、孝、忠、信诸德都是“仁体”的要素或侧面。是故可说,理学的“仁为全德”“仁包四德”观念是其仁学本体的延伸结果,也是儒家道德哲学体系愈趋明晰、整饬的成就。

是故,仁体论层面上的“仁”是总摄全部道德的本源概念,而与义、礼、智对言而成四德之“仁”则是“仁体”之“用”^③。显然,《西铭》和程朱“理一分殊”的阐释立论在“仁体”的基础上,由此仁孝的“理一分殊”关系才能顺理成章地表示成“仁体孝用”之说^④。使“理一”与“分殊”、体与用恰切分际的,便是“义”。朱子谓:

仁只是流出来底,义是合当做起底。如水,流动处是仁;流为江河,汇为池沼,便是义。如恻隐之心便是仁;爱父母,爱兄弟,爱乡党,爱朋友故旧,有许多等差,便是义……其慈,其孝,这便是仁;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这便是义。这个物事分不得,流出来便是仁;仁打一动,义礼智便随在这里了。^⑤

只有立足于整全之“仁体”与分殊的诸德性的划分,朱子此论才不是概念的混乱。仁体就像浑沦的水之本体,其流至何处便分殊为何种合宜的德性。相应地,“仁体孝用”论也应在如是层次上理解,也即回到《西铭》类比论的“由孝见仁”与“理一分殊”阐释的“由仁见孝”的背景下理解。而无论质疑“仁体孝用”论者或明确表示仁孝“二本”者,都将“仁”局限为爱家庭之外的德性。

三、仁孝一本

以上依据《西铭》阐释,我们呈现了理学贯通仁孝的卓越贡献。这种贯通的关系如需一凝练的理论概括,则是“一本”。这又须借助“一本”“二本”问题的阐释而成立。本来,“一本”“二本”是孟子批判墨家兼爱而提出的划分。到了理学的《西铭》阐释中,因为要区别于墨家兼爱,也常引入“一本”“二本”的区分。不过,其涵义常被研究者误用,亟待澄清,为此我们须先回到《孟子》该章,体察其中微意。

墨者夷之来求见,显然带着思想交锋的目的,但他的表现方式是尝试拉近儒墨的距离。一则,其引用《康诰》“若保赤子”句,以为儒家也有爱无差等的一面。孟子随即澄清了这句不是如此含义。二则,其谓“爱无差等,施由亲始”,是以墨家“爱无差等”为原则,儒家“爱由亲始”为手段,这样表达又是为他自己厚葬其亲作遁辞。对此,孟子则抓住了墨家兼爱的内在悖论——这不符合人性的自然。他举了三个事例来说明:一是夷之厚葬其亲,二是人不会爱邻人之子若其兄之子,三是还原葬礼起源的思想实验。这

① 尹焞:《跋〈西铭〉》,曾枣庄主编:《宋代序跋全编》卷124,济南:齐鲁书社,2015年,第3491页。

② 参见白奚:《“全德之名”和仁圣关系——关于“仁”在孔子学说中的地位的思考》,《孔子研究》2002年第4期;陈来:《朱子思想中的四德论》,《哲学研究》2011年第1期;陈来:《仁统四德——论仁与现代价值的关系》,《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唐文明:《朱子论天地以生物为心》,《清华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③ 清儒王植已有此区分:“以仁义礼智之事为仁之体,以仁义礼智之各当者为仁之用。盖以专言者明之,较前后仅言爱之理者,义更广矣。玩此,则知《西铭》前半言万物一体者,非专为用爱而设,乃举性量本然之全体;后半言圣贤尽性者,非专言成己之学,乃所以尽吾性体用之全量也。”王植:《正蒙初义》,西安:三秦出版社,2020年,第499页。

④ 参见唐文明:《仁感与孝应》,《哲学动态》2020年第3期。

⑤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2797页。

三件事中,第二件与回答“若保赤子”的误解有关。第一、三事是同一类,前后呼应。正是经由葬亲当中自然情感的反复触动,夷之最终被说服了。我们关注的“一本”“二本”问题,就在这一过程中出现。

孟子以“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总领还原葬礼起源的故事,是故,“一本”“二本”的含义也须结合该故事来理解。孟子设想,上古无土葬之礼,只能曝尸荒野。一日人子偶然撞见亲之遗体,见其惨状。人子不能不视,因眷恋担忧之情不能已;又无法直视,因哀痛愧惭之情不能已。故“其颡有泚,中心达于面目”,必掩其亲而后已。这一人性还原故事的生动与普适,堪与“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相比。孟子用这一故事“启发”墨者夷之正视自身厚葬其亲的性情,这是人性不能抑止的自然趋向。

在此意义上,再来体味孟子“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的含义。朱子谓:“且人物之生,必各本于父母而无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所谓一本者,于此见之,尤为亲切。”^①这是说,上天使人乃至动物都有自然眷恋、依附于父母的性情。这在日常生活中也许随处可见,也许隐而不彰,惟有丧祭之礼最专注且迫切地表达着人性的这一趋向。阴阳永隔后,人仍眷恋、追思其亲,这种不能抑止的人性趋向,对象是唯一的,力量是不竭的,故谓之“一本”。所以,这里的“一”是动词,表示专一、贯注的含义。适用于孟子的葬礼还原故事中,“一本”首先刻画的是一种道德情感,眷恋、担忧、羞愧等复杂交织,持续地系念在先人身上。这些情感发生在人子的心灵、意念中,古人谓心灵、意念的专注不分正是用“一(壹)”表示。进而,“一本”不止是心灵的波动,它会延伸为葬礼之后孝子终身奉事祭祀的行动。“一本”之“一”也是“一以贯之”之“一”。龙涌霖指出,“一以贯之”最初指君子行道始终如一,它上承西周“慎始敬终”的“一德”传统^②。那么,人子只有终身祭祀,有始有终地表达“一本”,才能真正具备“孝”德。

并且,“一本”作为动宾短语,而不是名词概念,符合该句“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的“使役式”语法结构。古汉语研究已明确,“使役式”的后承为动宾短语,表示使某人做某事^③。《孟子·万章下》的名言“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④,正与“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语法相同,又符合“使役式”语法,“觉后知”“觉后觉”都是动宾短语。这是“一本”为动宾结构的有力佐证。

之所以强调孟子“一本”论的专注、一贯含义,因为我们必须正视孟子举例丧祭之礼的学术渊源。从《孟子》所载问答内容看,孟子显然于《诗》《书》《礼》《春秋》极精熟。而无论说服诸侯,还是与诸子思想交锋时,孟子都将经典的义理巧妙转化为精彩的论说。故孟子思想必须回溯至经典的义理基础,才能见其全体与妙用。由此,孟子辟墨家兼爱,举出丧葬之礼做一思想还原的实验,无疑最切中要害。要之,亲丧的时刻最使人子反思自身所从来,丧祭之礼最真切地展现了父子之伦的分毫不可解。回到孟子的葬礼还原故事,他创造了“一本”观念来刻画父子之伦的分毫不可解,其无疑取材于礼家所论丧祭之礼的根本精神——“报本反始”。

相应地,当心灵与德行不能保持专注、一贯时,便是“二”。朱子的把握很准确,其谓“人物之生,必各本于父母而无二”,这里“二”是支离的含义,作动词用。墨家“视其父母本无异于路人”,这是不能体会到自身存在本于父母的事实,没有专注于自身眷恋、报本于父母的性情。这就是失其本,不能报其本,是谓“二本”。当前,一种“二本”的解读是,兼爱将他人与父母等视,故“人的生命,竟有‘二本’(两个根源,有二父母)”^⑤,这恐是误解。我们细味朱子答弟子问的三句话:

①④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2—263,310页。

② 龙涌霖:《“一贯”与“力行”——孔子“一以贯之”说新解》,《中国哲学史》2022年第3期。

③ 参见徐丹:《“使”字句的演变——兼谈“使”字的语法化》,吴福祥、洪波主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33页;丁丁:《“使”“令”字使役式从上古到中古的演变》,《语言学论丛》第60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314—334页。

⑤ 林月惠:《一本与一体——儒家一体观的意涵及其现代意义》,《原道》第7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4页。

爱无差等,何止二本?盖千万本也。

事他人之亲,如己之亲,则是两个一样重了,如一本有两根也。

人只是一父母所生,如木只是一根株。夷子却视他人之亲犹己之亲,如牵彼树根,强合此树根。^①

人不可能真的有“二本”,“一本”也不可能有“两根”,这在事实与逻辑上都不成立。若必强此说,只会架空“本”与“父母”的内涵,使其变成虚辞。是故,“何止二本?盖千万本也”如果理解成将他人人都视作其父母,认为其为本,那概念上自是有千万本,但这就丧失了“本”的意义。因为“本”就其内涵只能有一个,不存在第二个“本”。所以这句应理解为,本一旦支离、失去后,就不止会支离为二,其支离是无尽的。“一本有两根”的反讽和“木只是一根株”的譬喻,都表明朱子坚持“本”只有一个。强牵他人父母与自身存在的关联,只会架空“父母”之名,不能动摇“本”的真实。

以上我们澄清了“一本”“二本”的内涵。不过,程朱在阐释《西铭》时只是关联了“一本”“二本”之分作为儒墨之分际,于“一本”观念本身,于《西铭》中仁孝关系的进一步理论融贯仍有未尽之处。有鉴于孟子“一本”论和《西铭》类比论都植根于礼学的深厚背景,故可作进一步申说,使“一本”观念得以融贯仁与孝二者。

第一,前文已述,“孝”是经存在论反思的德行,孟子据丧祭之礼的“报本”精神创造性地转化出“一本”观念,以生动展现这种存在论反思的自然、真挚。第二,战国两汉儒学还有一条追寻仁体的存在论反思之路,其揭示出人之“本”不止于父母、祖宗,最终应上溯至“天地”之“本”。面对超验本源难以概念言说的境地,此间的儒家创造出以“父母生”类比地言说“天生”的独特传统。《西铭》则遥承此传统,论述更为透辟。第三,我们看程朱的《西铭》阐释,无论是就“体”的层面,表示存在论反思由“父母生”向“天生”上溯,还是就“用”的层面,表示“事亲之孝”是“事天之仁”的“样子”,乃至综合体用两面,概括出“仁体孝用”“理一分殊”的结构,主旨都是强调由“孝”识“仁”的一贯、必然。第四,由“孝”识“仁”的一贯,其动力显然正发端于“孝”的“一本”反思。由此,我们便能恰切关联起《孟子》、战国两汉“父母生”“天生”类比与理学《西铭》阐释的思想线索,顺理成章地揭示,当人反思自身所从来,“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的动力将使其首先体会到“父母生”与“孝”的本真性,而最终体会到“天生”与“仁”的本真性。仁孝之所以不二,皆因“一本”之心贯之,是谓“仁孝一本”。

四、与当代仁孝诸论的商榷

“仁孝一本”论在古代能够成立,在现代却面临诸多挑战。这可归纳为日常与形而上两层面。日常层面的挑战在于,社会形势翻天覆地的变化,使道德生活的经验与架构迥异于古代。20世纪以来,围绕家与国、公与私、仁与孝的争论持续不断。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亲亲相隐”之争,促使儒家重新唤起仁孝关系问题,并反思现代社会。这一层面的研究还在推进^②。至于形而上学层面的挑战,则是现代社会背后的宇宙论、存在论基础,同样在社会形势变迁的过程中替代了古典的宇宙论、存在论基础。这是“仁孝一本”论面临的更深刻的困境。在古今之变的背景下,我们会发现,当代的仁孝关系诸论均不同于《西铭》开出的理学的“仁孝一本”论。代表性的立场可归纳为三种,通过逐一评析它们,既能由“仁孝一本”论反思当代论说的可商之处,又可由当代论说映照“仁孝一本”论的现代困境。这是双重的比较,并非捍卫单一的立场,而是通过反思各种方案的价值,以期切中时代的新理解能够出现。

当代第一种立场可归纳为“仁孝二本”论。基于经验生活中仁、孝两种德行的诸多差异,认为二者本

^①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1313—1314页。

^② 参见陈立胜:《“乾坤大而父母亦不小”——儒家传统中的“一本”“二本”之辨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南国学术——澳门大学学报》2026年第2期。

就有不同的依据,即仁本于天和孝本于亲,主张维持二者的张力,反对传统的一元思维^①。须先指出,此所谓“二本”是现代概念,“本”指本体或本原,“二”指两个。这与本文主张的“一本”“二本”说不同。先秦的“本”无本体之意,而是从“本”作为树根的形象提炼出的本末之别。其实论者也意识到,与“仁”的本体地位相比,“孝”不具备本体意义,故退一步称为“本原”。相应地,这一立场便不致力于道德形而上学的探讨。

可是,从道德经验中溯源地体会到仁本于天、孝本于亲,这是古代儒家也默认的事实,否则《西铭》何必使用类比?“仁孝二本”论主张应重视仁孝之别,但放弃了贯通仁孝的抱负,便没有形而上的背景思考。文中已表明,天与亲之间的连续性,由宇宙论上的气化论和存在论上的类比论所保证。“二本”论已放弃这一形而上基础。

第二种立场可归纳为“亲本”论。21世纪以来,捍卫“孝”的意义,乃至以之为中国文明特质的研究,有一条深入到《丧服》学传统的脉络。《丧服》用“一体”来描述父与子的关系,而且父子代代相传,每一环皆为“一体”,故上溯为尊尊之统。论者将此与孟子“一本”论衔接起来,谓“一体的思想源于‘一本’的社会意识,即以父母为本”。并且,此论往往具有文明比较的意识,为区别中西文明的特质,会延伸地认为中国文明“非以天为本或以神为本”^②。值得注意的是,王夫之论《西铭》与“一本”“二本”的内容多为“亲本”论者所引据^③。

虽然将“一体”与“尊统”衔接于“一本”是精当的提示,但仅以父母为本则矫枉过正。这既不合于古代的宇宙论及以此为背景的祭礼体系,也忽略了正是从礼学传统中提炼出的“仁孝一本”论的意义。至于所据王夫之的论说,一方面,我们应知人论世,王夫之是受佛教、墨家的刺激而偏言此^④;另一方面,即使王夫之谓“从其切者而言之,则别无所谓乾,父即生我之乾,别无所谓坤,母即成我之坤”^⑤,”天即在父母之中,而父母即吾天”^⑥,其理论中仍保留了“天”的位置。他仍承认“从其大者而言之,则乾坤为父母,人物之胥生,生于天地之德也固然矣”^⑦一层。其实,王夫之以父母为“天”之论,有《丧服传》“父者,子之天”的依据,但是董仲舒曾引此语并补上“天者,父之天”这一贯通的天亲关系。是故,王夫之所论置于儒家仁孝关系论的整体脉络中,只是视角的调整,还不是“亲本”论者的依凭。而“亲本”论则面临仅以“父”为“天”,截断了“天者,父之天”的批评。

第三种立场可概括为“天本”视野下的仁感孝应论。此论有志于接续《西铭》的理学阐释,惟立论重心在“天本”。具体而言,其基于“仁为天地之心”的命题,主张人体会到天地生生之仁,会切身地表现为孝,“天地以仁感人,而人以孝应之”^⑧。这是对理学“仁体孝用”论的创造性阐发,却也是程朱从未谈及的结论。其与传统的关键分歧,就是侧重于“天本”,从而将仁、孝的理一分殊或体一用关系,转化为感一应关系。其困难在于,将孝的生发理解为感天地之仁后的切近响应,不符合两种道德的日常情感经验,也取消了《西铭》阐释中的存在论类比思路。并且,存在论类比依托于气论中天地与父母之间的理一分殊关系,但我们发现仁感孝应论不依赖气论,只依据一种精神上的感通能力。这当中的区别在于,气论所具有的分殊性质,解释了德性的差异,即默示了由孝达仁的提升不是人人都能做到;而精神性的感通能

① 田丰:《论仁孝二本》,《哲学研究》2020年第11期。

② 周飞舟:《一本与一体:中国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2021年第4期。

③ 参见周飞舟:《一本与一体:中国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2021年第4期;林鹄:《尊尊与一本——从“正尊降服”谈起》,《中国哲学史》2025年第3期。

④ 吕妙芬:《多元视域中的明清理学》,第466页。

⑤⑦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4,313页。

⑥ 王夫之:《四书训义》,《船山全书》第8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348页。

⑧ 唐文明:《仁感与孝应》,《哲学动态》2020年第3期。

力,则是由天地之仁而下贯及孝,默认了人人皆因秉天地之性而能。并且,由孝及仁的上升,在道德经验上尚可切近地想象;仁感孝应的下贯,则须在道德经验层面作更详细的说明。

总之,当今有代表性的三种仁孝论都不同于理学“仁孝一本”论。此番对照不是强求其同,而是借此反映理学“仁孝一本”论的优长与现今困境。此理论的优长在于,既承认仁孝在道德经验、适用领域上有别,也在形而上学与修养工夫层面使之贯通。保持分立与贯通的平衡,不主于天、亲任何一边,也不放弃贯通的必要性。并且这极大地受惠于它对战国两汉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周全把握。从张载到程朱,他们对气化宇宙论和祭礼体系的把握,视野完整、尺度恰切。

然而,我们也必须重视当代三种仁孝论。特别是它们背后的考虑,如对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批评,如文明比较焦虑下的自限或对标等。因为它们都标志着理学“仁孝一本”论的思想基础,尤其是战国两汉以来的精神传统在现代世界的困境。首先是形而上层面,气化宇宙论在现代世界退隐,使“天生”与“父母生”的理一分殊关系难以被理解。其次是存在论层面,不论是对“天生”之仁还是“父母生”之孝的反思性认识都失落了,其间的类比关系也难说明。最后,仁与孝两种德性无论在道德心理还是道德行为的适用领域上,社会现实的巨大变迁使古今经验不再通约,向现代生活说明古典的道德经验,可谓难上加难。只有直面这些基础命题,作出新的论证,才能使儒家的仁孝论在当代更有说服力。

The Western Inscription and Neo-Confucianism's Unity of Benevolence and Filial Piety: A Critique of Three Contemporary Theories

Gong Zhichong

Abstract: Benevolence and filial piety lie at the core of Confucian ethics. Neo-Confucianism elucidated the essence of benevolence and redefined their inner bond, as prominently reflected in interpretations of *The Western Inscription* 西铭. Metaphysically, the text revives the ancient ontological parallel of being begotten by parents and by Heaven. Practically, it leads people to perceive heavenly benevolence through familial filial piety, inheriting the classical ritual spirit of honoring parents and Heaven while remembering one's origin. Mencius' distinction of one origin 一本 and two origins 二本 stems from the same ritual tradition. The idea of one origin underpins Neo-Confucianism's core claim: benevolence and filial piety share a single foundational source. Compared with three contemporary theories, this doctrine shows both inherent merits and modern dilemmas. To make Confucian ethics of benevolence and filial piety intellectually compelling today, it must adapt to modern shifts in metaphysics, moral epistemology and psychology with renewed theoretical reasoning.

Keywords: benevolence and filial piety; birth from parents; birth from Heaven; one origin

【责任编辑:全广秀;责任校对:全广秀,张慕华】